

汪寿华：敢于赴死的工人运动先驱

□ 陈安杰

汪寿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人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员。他曾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，胜利后当选上海特别临时政府委员、上海总工会委员长。1927年4月被上海青洪帮头目杜月笙杀害，牺牲时年仅26岁。

“努力、努力，无时可息，制造文明的武器，来做国家的根基”

汪寿华，原名何纪元，字介尘，化名何今亮、何松林等，1901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檀溪乡泉畈村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。1917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受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，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。他关心国家的命运，同情贫苦人民，经常阅读《新青年》等进步刊物，立志下“苦学”的功夫，为了改造中国的“真正弱点”，“努力、努力，无时可息，制造文明的武器，来做国家的根基”。

1920年6月，汪寿华在上海参加沪滨工读互助团，9月到位于霞飞路渔阳里（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）的外国语学社学习。不久，经俞秀松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。与汪寿华同一时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还有刘少奇、任弼时、罗觉（罗亦农）、李启汉等革命青年，他们成为最早发展的一批青年团员。

翌年，汪寿华与同学一道，离开上海，奔赴苏俄学习深造。然而，由于无法直接抵达莫斯科，汪寿华只得在西伯利亚的伯力等地从事华工教育。1923年，汪寿华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作为远东职工代表在莫斯科出席国际反帝同盟会议。1924年当选海参崴职工苏维埃委员，同年底奉调回国。中共中央局决定新的上海区委由王一飞、汪寿华、庄文恭等委员组成，汪寿华负责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。

“他们不来，我们自己干！”

1925年1月，汪寿华参加中国共

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并向大会作了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。会后留在上海工作，先后担任中共江浙区委委员、常委、区委农工部主任委员、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。五卅运动爆发时，汪寿华转任上海总工会宣传部主任，积极协助李立三、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。不久，担任中共江浙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，兼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。由于反动当局数次查封上海总工会，并四处搜捕汪寿华，为继续深入在工人群众中做宣传，他不得不改名换姓，在白色恐怖中顽强领导着上海工人运动。

从1926年5月开始，作为上海区委军事特别委员会成员的汪寿华，多次发动上海各行业工人进行大规模罢工斗争，并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的第一、二次武装起义。当时，由于准备不足和缺乏斗争经验，上海工人发动的前两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。

1927年2月23日，中共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，在总结前两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教训的同时，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。由周恩来、罗亦农、赵世炎、汪寿华等八人组成特别委员会。3月4日，汪寿华主持召开上海工会干部会议，决定组织5000人的工人纠察队，并秘密开展武装训练。

同年3月20日，北伐军进驻上海龙华，汪寿华派人到龙华请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派部队配合工人起义，希望能内外夹击，消灭军阀。但白崇禧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，按兵不动，妄图借军阀之手消灭工人武装。汪寿华知道后十分气愤地对同志们说：“他们不来，我们自己干！”

1927年3月21日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。整个行动由特别委员会指挥。参加罢工的达到80万人，直接参加作战的有1万多人，罢工后1小时，立即转入武装起义，上海7个区的工人纠察队同时向敌人发动了攻击。起义期间，汪寿华和周恩来、罗亦农、赵世炎等全程指挥战斗，日夜不息，忘我工作。同志们劝汪寿华休息，他说：“起义这么紧张，工人兄弟們都在和敌人厮杀，我怎么能休息呢？”经过28小时的血战，起义军最终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，起义取得了胜利。

22日，在上海南市召开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，成立上海特别临时政府，汪寿华当选为政府委员，在临时政府第一次委员会上，汪寿华被选为五名常务委员之一。27日，汪寿华主持全市工人代表大会，向大会提出了收回租界、肃清一切反动派、改善工人生活等十七项任务。次日，他当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。

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，宁愿牺牲一切！

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和工会力量的不断壮大，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。他们调集军队，炫耀武力，叫嚣“决不放弃上海”。蒋介石进入上海后，与帝国主义秘密勾结，加紧策划一场血腥的反革命大屠杀。

1927年4月11日，杜月笙以“有机密大事商议”为由，“邀请”汪寿华赴宴，汪寿华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。在讨论他是否去赴宴的问题上，党的领导机关出现了意见分歧。党内有同志劝他不要去，原因是杜月笙这伙流氓反复无常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；也有同志认为去也无妨，去了可以摸清敌人的底细，但务必要注意安全。此时，汪寿华坚定地说，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流氓打交道，不去反让人耻笑。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，宁愿牺牲一切！汪寿华以前无畏的英雄气概按时赴约。临行前，他嘱咐妻子不要害怕，请好好照顾母亲。

为安全起见，组织上决定由李泊之陪同前往。但就在两人即将到达杜宅时，汪寿华让李泊之在华格慕路（今宁海西路）杜月笙住处不远的地方等他，如果两小时他还不出来，即有意外，要李立即报告党组织。汪寿华一走进杜月笙住宅，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杜月笙手下的“四大金刚”捂住口鼻，装进麻袋，押上汽车，运到枫林桥活埋。噩耗传来，许多与汪寿华并肩战斗的工人们失声痛哭。

次日凌晨，蒋介石便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，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，汪寿华成为这次政变中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员。汪寿华生前讲：“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，我们应尽力地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。如果牺牲了，以后的路自会有人来继续走下去的。”

打响胶东武装抗日的第一枪

——天福山起义纪念碑文敬读

□ 于 潇

光芒！

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这篇慷慨激昂的碑文，生动再现了天福山起义的全过程，展现出胶东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决心。

红旗插上天福山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中华民族陷入了严重危机，在这关系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胶东特委遵照北方局和山东省委的指示，积极开展统战工作，与胶东各地的国民党地方政府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。12月初，日军从海上登陆青岛，准备进攻烟台，胶东地区的战争形势日趋紧张。当日寇的魔爪正伸向胶东人民之时，刚被营救出狱的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奉命回到胶东，开始着手整顿党组织、重建胶东特委，并于12月15日晚在天福山脚下的沟于家村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。会上，理琪传达了山东省委的相关指示，并最终一致决定于12月24日在地处偏僻、敌人统治力量薄弱、群众基础较好的文登县天福山发动武装起义；组建以崑崙山红军游击队为骨干力量的“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”。

12月24日深夜，理琪带领中共胶东特委的同志，披着月光，顶着寒风，登上了天福山。他们在山上的玉皇庙里连夜研究制定起义计划。天刚亮，于得水率领的崑崙山红军游击队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赶来了，随后，胶东其他地区零星参加起义的同志也相继赶到天福山，一共有80多人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起义仪式正式开始。首先，理琪代表胶东特委作了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。随后，他庄严宣布“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”正式成立，并将“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”的军旗郑重授给大队长于得水和政委宋澄。于得水掏出手枪，向空中连发三枪，以此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胶东第一支抗日武装正式诞生。之后，抗日救国的大旗高高飘扬在胶东地区的上空，抗日革命的烽火在胶东的土地上熊熊燃烧起来。

岭上遇袭再崛起

起义第二天，第一大队遵从特委

部署从天福山出发西上进行抗日宣传，他们每到一村一镇，都张贴标语，分发抗战宣传品，表演抗战节目，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，鼓动和组织群众有序参加抗日救国活动，一时间形成了胶东儿女踊跃报名参军的景象。然而，第三军声势的逐渐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恐慌，他们害怕起义队伍日益壮大最终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，因而暗中勾结，寻找机会，企图吞并起义部队。

12月31日，当第一大队到达文登西部岭上村开展抗日宣传时，突然遭到国民党数百名军警的包围和袭击。面对国民党反动武装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，第三军政委宋澄向对方晓以民族大义，高喊爱国口号。但国民党反动武装撕毁合作抗日的协议，对起义部队进行了疯狂围捕。危急时刻，于得水率领起义部队奋力抵抗、顽强搏斗，但因寡不敌众，起义队伍损失惨重，除于得水率部分同志突出重围以外，宋澄等29名同志被捕，中队长王洪、邢京昌，小队长隋清源3位同志被敌人秘密杀害，起义严重受挫。

虽然“岭上事件”使刚成立不久的第三军损失严重，但胶东特委建立抗日武装、发动抗日救国起义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。他们克服重重困难，抓紧时间，重新组建和发展其他抗日武装，继续坚持革命斗争，并于1938年1月15日成功发动了威海起义。

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

1938年2月初，日军从青岛出发进占了烟台，随后又兵分两路：一路西犯蓬黄掖诸县，一路东犯牟平，并在牟平建立了伪政权。为粉碎伪政权，赶走日本侵略者，胶东特委决定西上抗日，攻打牟平城。2月12日晚，理琪、林一山率领起义部队奇袭牟平，第三军指战员作战勇猛，速战

为了新中国——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

□ 茂 钦

应先把书印出来，待卖了书后再付印刷费。

翻译此书 的11位同仁，也都明确表示尽义务不要稿酬。买纸张的钱，也是胡愈之采取秘密推销预订的办法，预收书费每册1元，用于支付第一版的纸张钱。

作者斯诺助一臂之力

书的原作者斯诺，早在来华之初，就耳闻目睹了中华民族饱遭内忧外患，决心要对中国的老百姓有所帮助，也因此置安危生死于度外，潜赴陕北采访，写成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而今，为使中国民众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苏区，对胡愈之翻译出版此书给予大力支持。

除了对原作作了修改补充外，增加了在“红色中国”采访时拍摄的大量照片，包括毛泽东穿红军服、戴红五星八角帽的半身照片，斯诺自称这是为毛泽东拍的众多照片中最好的一张。

斯诺还将版权无偿赠送给了胡愈之。他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表白：“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。因此，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，希望这个译本，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，有广大的销路，因而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。”

《西行漫记》秘密出版前后

章节，分头翻译。

12人都是专家，未 满一个月，各自翻译完毕，理顺润色后，交到胡愈之处。胡愈之夜以继日，对各人译文作了认真校阅，发现疑难文字及时与斯诺磋商，力求准确达意。最后在文句上再作修饰，使之从头到尾浑然一体，风格如一。

瞒天过海的“地下”出版

书是译成定稿了，出版却碰到了难题。

当时的上海已被日寇侵占，只剩下称之为“孤岛”的租界。胡愈之连走了几家日占地的出版社，都是无果而归，是因为出版商担心事泄遭日军残暴镇压而不敢接受。至于租界里的出版商，因美、英等宣布在中日冲突中恪守中立，所以也都婉言拒绝了胡愈之送上门来的“生意”，以免引来麻烦。

胡愈之不甘半途而废，决计作瞒天过海的“地下”出版。他在自己所住的福照路安乐村一七四号，挂起了有名无实的出版社招牌——复社，将书稿交与熟识的商务印书馆工人印刷装订。

印刷工人熟识、敬仰心怀正义感、爱国情的胡愈之，甘冒风险接受下来暗中印刷。当他们知道胡愈之筹措资金一时不能到位，欣然答

《西行漫记》原名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（英文《Red Star Over China》），作者是被毛泽东赞为“老朋友”的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。斯诺于1936年6月初赴陕北采访，4个月后返回北平。1937年10月，他的采访录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在伦敦出版后，立时轰动了欧美各国，西方舆论高度评价：此书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与描述，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，是震惊世界的成就！

联络救亡志士合力翻译

1937年11月，寓居北平的斯诺来到上海，会见了同为记者的文化界救亡领袖胡愈之，以英文版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一册相赠。胡愈之阅读后，顿觉眼前为之一亮，萌生了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，使各界人士对中共领导下的陕北这块“未知地”，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。

于是他付诸行动，四处奔走，联络到文化教育界11位熟悉英文的救亡志士，他们分别是：林淡秋、王厂青、章育武、吴景松、胡仲持、许达、傅东华、邵宗汉、倪文宙、梅益、冯宾符，连他自己共12人。

胡愈之向他们讲了翻译出版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构想及意义，大家一致赞同，当下将全书拆开，各取部分



速决，仅一小时便攻下牟平县城，活捉伪县长等170余人，缴获大量枪支。

次日，部队撤离到距牟平城1.5公里的雷神庙进行休息调整。正当理琪、林一山等特委领导在庙内开会商讨下一步行动之时，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，将雷神庙团团围住，发起了疯狂进攻。庙内仅有的20余名与会领导和队员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毫不畏惧，英勇抵抗，与日军浴血奋战七八个小时，接连打退了日军一次更甚一次的凶残进攻，终在晚上9点胜利突围。这次战斗取得了毙伤日军50余人、击落日机1架的重大胜利，不幸的是年仅30岁的理琪在战斗中壮烈牺牲。

攻克牟平城、血战雷神庙，打响 了胶东武装抗日的第一枪，给侵略日军以重大杀伤，震慑了日寇，振奋和坚定了胶东军民的抗日信心和意志。

天福山，一座伟大的山，一座光荣的山，一座英雄辈出的山！

掩敌耳目另起书名

关于中文译本的书名，胡愈之再三斟酌用心良苦，是因为考虑到其时日寇视共产党为死敌，国民党当局对中共尚未正式“解禁”，以原名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出版的话，这“红星”两字就会引人注意，于发行大有影响，于读者也不安全。为掩敌耳目，他最后敲定，把书名改作《西行漫记》，乍一看，还以为是一本游记呐！

只短短2个多月，中译本《西行漫记》问世，第一版印了1000册，胡愈之通过秘密渠道送到读者手中。因为内容都是神秘“红色中国”的人和事，谁不想知道？又因胡愈之毫不营利而只收工本费，故而成了抢手货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销路大开，不只好销日占区、国民党统治区，还畅销港澳及五大洲华人区。

半年多时间里，《西行漫记》重版了5次，印数高达8万余册，盗版本更是多不胜数。其时国共已重修旧好携手抗战，有的国民党官员也对《西行漫记》产生浓厚兴趣，他们有心了解共产党的真面貌，故而争相买来阅读。

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《西行漫记》，就是根据当年胡愈之主持出版的中译本印刷的，只是在封面《西行漫记》书名下，加上“原名：红星照耀中国”。